



拒绝流行

曹林 华中科技大学新传学院教授

刘欢不“通吃”

刘欢逝去,没有任何消息铺垫的讣告,突然得让人震惊。听刘欢的歌长大的一代人,更是充满“时代被夺走”的痛感。人们注意到他的“副教授”退休身份,纷纷替他鸣不平。

其实,不要以“赢者通吃”的俗念、执念去看待一个超凡脱俗的音乐君子。不必以教授身份去度量志不在此的刘欢,家喻户晓的他让自己的名字活在经典传承的音乐中。这种“不通吃”,值得赞美。

仔细品味一下这种逻辑,其实可能包含着一种“赢者通吃”的问题思维——歌唱得好,唱到家喻户晓、国家级歌唱家的层次,就应该给一个教授、博导身份,就应该给个行政身份,就应该授予博士学位,就应该如何如何……

只要一方面杰出了,就延伸到各方面形成“通吃”,这不是什么好事。刘欢虽然是教师,但他的核心身份是一个音乐人,这个身份早盖过了其他身份。以此行走天下,为众人所知,而不去争其他,不与那些把教授身份当饭碗的人争身份符号,吃肉不吧唧嘴,默默地教书,这很了不起。

从对外经贸大学礼待刘欢的方式来看,如果刘欢要拿自己的作品和声名去争一个教授身份,不是什么难事。——对外经贸大学更需要“刘欢教授”这个品牌,而不是刘欢更需要“对外经贸大学教授”这个身份。理由似乎也很充分,产学研结合,作品过硬,而且这个身份更有利于人才培养,让学生受益。但对外经贸大学和刘欢没这么做,很让人敬佩。如果这样做,自己作为音乐人的身份就不那么自由了,你一边拥有教授身份,占有相关资源,一边在外面开演唱会,参加各种商业演出,让学生以你的创作、演出档期为中心去排课调课,对其他教师就不公平了。

抛弃那种“通吃”思维,不要拿教授身份去度量已通过音乐将名字刻在人们心中的刘欢!



夕花朝拾

杨早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

米轨或寸轨?

我在2023年曾经坐过临安-团山的小火车。当时我认为它是米轨的,换句话说,铁道只有一米宽。但是今天我又去了趟蒙自,心一横还去了趟个旧。在个旧的“个碧石铁路公司旧址”我有点二乎了,它说个碧石铁路是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,是寸轨,它的宽度只有60厘米,换句话说,只有米轨的60%宽。那我坐上的小火车是米轨还是寸轨?

新的小火车线路是2015年开通的,从临安站(建水)到团山,纪念1915年个碧石铁路开通100周年。难道它还是保留了寸轨?

为此我查了许多网上的资料,才搞明白事情的原委。先说结论:2015年开通的“临安-团山”小火车是米轨(1000毫米),不是寸轨。容易混淆的点在于——它跑的那条老路基,历史上确实是寸轨。原来,2015年开行的建水古城小火车,是在原个碧临屏铁路建水东(临安站)至团山段“改造后的米轨铁路”上运行,官方定位就是“云南米轨铁路保护与开发利用示范性项目”。线路全长约13公里,走的都是这条米轨。个碧石铁路(个旧-碧色寨-临安-石屏)1915年开工、1936年全线通车时,原始轨距确实是600毫米,也就是寸轨,这是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的原貌。

后来,为了和滇越铁路(米轨)接轨,1969-1970年前后,蒙宝铁路(由个碧石铁路改建)把轨距从600毫米扩为1000毫米米轨。所以老铁路是寸轨出身,但现在跑旅游车的轨道是米轨。

懂了。我看到寸轨的个碧石铁路是如何对接米轨的滇越铁路的:有个转盘,寸轨的火车开到碧色寨,卸下货,放上米轨的火车,车头原地用转盘调头。这么设计,据说当年也是为防止设计滇越铁路的法国人用它来运兵。



星花的话

尤今 新加坡作家

“小馒头”

现在38岁的道尔吉玛,生命最初的六年是在蒙古包里度过的。她出生后,在乌兰巴托工作的父母便把她迢迢送到戈壁,交给给祖父母照顾。

沙漠里的昆虫如蟋蟀、螽斯、蚱蜢、蚂蚁、甲虫、蜘蛛、蜥蜴,等等,全都成了她的朋友,道尔吉玛甚至还曾有过一个“青梅竹马”——它胖嘟嘟、圆滚滚的,她给它取名“小馒头”。那是一只约莫三四个月大的野猪幼崽,与母猪失散后,被奶奶领回来饲养。“小馒头”天天跟着她进进出出,还能听懂一些简单的指令,让她觉得自己成日活在蜜缸里。

有一天,爷爷把羊群托付给邻居,带她到集市玩。她欢喜不已,尽兴而归。一回到蒙古包,便扬声喊道:“小馒头!”没有回应。这时,她看到矮桌上摆着一大锅焖肉,她吸了吸鼻子,高兴地问奶奶:“好香啊!您煮了什么?”奶奶说:“炖猪肉呢!”

猪肉?猪肉!她一下子懵了,等弄清楚锅里炖的竟然就是“小馒头”时,她张开嘴,哭得天崩地裂。她一边哭,一边喊:“小馒头”是我的朋友啊!你们怎么可以吃我的朋友!

奶奶抱着她解释:“野猪毕竟是野生动物,野性难驯,长大以后可能会伤害你呀!”

她哪里听得进去?那种痛彻心扉,成了她童年最大的伤。

●随手拍 图/文 吕文捷

辽阔壮美

初秋的天山天池,辽阔壮美。一艘快艇在湖面疾驰,艇尾漾起银波,艇上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风中猎猎。

随手拍专用邮箱:ycwbwyb@163.com



喧嚣之余

宋明炜 美国韦尔斯利学院讲座教授

马来半岛日记

乘车一路南下,离开槟城州,进入霹靂州,第一站是太平。我们参观了两个地方,一是咖啡工厂,南洋咖啡别有风味,买了几袋咖啡粉和咖啡巧克力;另一处是陈梓芬与孙中山的住处旧址,房子内部的细节都保留下来,真实历史就在细节之中。

车子再开动没多久,到了太平州森林公园。在一个河畔,许多繁茂树冠的大树连成一片,大家流连忘返,觉得确实是世外一景。车子继续往南,到了怡宝,此地许多景色因为《流俗地》的描写而闻名,可见黎紫书带给此地的重要意义。怡宝是一个衰颓的槟城的乔治城的感觉,建筑风格相似,但更古旧。我们跟着当地文史专家,一路走过霹靂国民华小学、土地庙以及廉价出租房,甚至还有二奶巷、三奶巷等。一个小小弄堂也别有一番洞天,旧日香港的海报铺天盖地,穷街陋巷里有前卫的画展。

离开怡宝后,继续沿着高速公路南下,天黑之前抵达吉隆坡,先去品尝正宗的肉骨茶,这里完全是繁华的大都市。从槟城过来,一日之间感觉宛如两个世界。吉隆坡双塔,曾经的世界最高建筑,让天际线变得魔幻。



不知不觉

钟红明 上海《收获》杂志执行主编

再见

九月底去李洱的北大讲堂,给孙惠芬的长篇《紫山》做活动,遇到了多年未见的作家刘恒。

想起当年去鲁院找余华,正读研究生班的他领着我到人民日报宿舍楼拜访刘恒,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刘恒。后来他搬到前门,再后来是牛街,甚至我们在黄山的雪地里擦肩而过,千米,同时回转身,他和儿子上山,而我和大学同学下山。那是我遇见过的黄山最美的时刻。

记得1993年第1期《收获》,我编发了刘恒的长篇《苍河白日梦》,以清末民初江南曹氏大宅院的兴衰为背景。我印象最深的是,它通篇采用老年家仆的第一人称回忆视角,一双旁观者的眼睛,是局内人,但其实又是依附于这个宅院的局外人。从少年到老年,他见证了曹家几代人的命运;曹家老爷曹光汉受过新式教育,带着理想回到故乡,想要造机器、实业救国,可他既无法改造封闭乡土,也无法处理情感,最终被吞噬。他身上叠合了近代知识分子典型的困境。

少奶奶郑玉楠受过教育,内心渴望自由,却在无爱的婚姻里被困,到头来,所有人都在人性的焦灼、挣扎中慢慢被消耗殆尽,“苍河”变成一场白昼虚空的幻梦。这部作品的语言难度其实很高,因为通篇的口语文本,必须完成长篇叙事的目的要求,同时又要恪守第一人称的视角和少年的理解力……



梅川随感

陈子善 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

新的“小团圆”

9月24日,浙江乌镇木心美术馆2026年特展“回望张爱玲”隆重开幕。次日,许子东兄和我应陈丹青兄之邀,分别作了专题演讲,许兄讲的是“张爱玲笔下的爱情与婚姻”,我讲的是“张爱玲作品内地接受史”。

这是张爱玲逝世三十一年之后,内地举行的第一个张爱玲特展。木心生前多次高度评价张爱玲,认为“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,‘才华’,唯鲁迅、张爱玲二位”,“张爱玲的灵光精气也是不会被淹没的,她能够活在她的作品里。”也因此,由木心美术馆主办这个张爱玲特展,当然再合适不过。

“回望张爱玲”,如何回望?这个展览以首次与内地读者见面的张爱玲手稿回望,以张爱玲的创作集回望,以张爱玲的名言警句回望,以鲜为人知的张爱玲各个时期的遗照回望,以张爱玲的私人衣物回望……尽管展品不是很多,却大多是精品,而布置之别出心裁,也令人难忘。

譬如手稿,由台北皇冠文化集团和海上收藏家热情提供,包括张爱玲后期的长篇《小团圆》和图文集《对照记》的部分手稿,以及散文《四十而不惑》手稿(此文中正好写到鲁迅)。更难得的是,还有目前已知唯一存世的张爱玲前期手稿——电影《太太万岁》的两页手稿。这样,张爱玲前后后期的创作手稿,第一次在“回望张爱玲”特展上“小团圆”了,又是一个第一次。从研究张爱玲的角度视之,这次“小团圆”意义非凡。

相信这个“张爱玲特展”不但能使广大张爱玲读者大开眼界,也一定会对张爱玲研究有所推动。



以学术为志业，寻找饮食文化“向上”之路

□周松芳

家室100余平方米,每个房间都有一面书墙,用来盛放常用书;不用或用过的书约上万册藏于“芳村书库”。秉持书尽其用的理念,充分使用电子书和数据库。

小时候生活在偏僻落后的乡间,基本上没什么书可读,如果就与我今天所从事的文史研究与写作的相关性来说,最早读的应该是《三字经》《增广贤文》和《声律启蒙》,那是父亲背诵及默写出来教我们的。稍长,父亲与伯父冬日围炉诵古诗文及吟对联句之余,也拿出早年抄家之后仅存的一本线装书——王尧衢的《古唐诗合解》,引领我们走进传统诗文。后来离乡求学,唯升学是望,大学学经济,毕业后从事经济管理工作,又独学无侣,文史之学既未入门,也无从求进。直到生病住院及病后休养,心茫然,顾往日瞻前,遂决定考研,读了中山大学的古代文学硕士。由于养病的需要,以及补上中文本科课程的耽搁,硕士期间学业欠佳,便思深造。幸得黄天骥师收入门墙,始真正走上传统文史研究之路。能作为标志性事件的,大概就是博士论文《自负一代文宗:刘基研究》,无论在答辩时,还是在申请出版基金资助时,都颇获好评,顺利通过。

既已入门,就会不断深入,所以即使毕业后没有从事教学科研工作,仍在文史研究的道路上继续跋涉,并时有所获。比如应约搜集整理岭南古代饮食史料,担心如此简单出版能看懂的人少,难有销路,有违初衷,便加以阐释:先在纸媒以专栏的方式刊布,然后结集成《岭南饕餮:广东饮膳九章》,从此走上饮食文化史研究与写作的“歧途”。渴泽而渔式

地搜掠近现代饮食史料,写作和出版了《民国味道:岭南饮食的黄金时代》《岭南饮食随谈》《海派粤菜与海外粤菜》《岭南饮食文化》《饮食西游记:晚清民国海外中餐馆的历史与文化》《粤菜北渐记》《川菜东征记》等,从书名看,即知主要是偏向饮食文化传播。

逝味难寻,窃以为老菜谱的发掘整理,才是饮食文化史研究的核心要义之一。所以先后整理出版了《民国粤味1:粤菜师傅的老菜谱》《民国粤味2:府邸食单》,广州酒家据以研发打造了两期《民国粤味宴》,足以证明我的努力功不唐捐。年内还会继续推出与广州饮食有关的著作。

这些研究与写作,大大拓宽了我的阅读范围及研读的深度。在借助数据库充分研读晚清民国著述与报刊史料的同时,追逐近年新出的晚清民国名人日记史料及相关研究著述。饮食文化史必涉及众多人物,为了下笔更有分寸感,我还同时搜读了相关人物的年谱、文集与研究著述。这颇不同于其他食学研究者和饮食写作者。自认不同凡响的另一面,则是努力将饮食及其历史文化的研究引向“向上”一路,纳入社会生活史乃至文化学文化史和社会政治史等主流研究的畛域。接下来准备写的《得闲饮茶——近现代工商业的发展与广州茶楼的勃兴》,则可集中展示这方面的努力,与此同时,还旁及荔枝文化史的研究著述。



周松芳,文学博士,文史学者,著有《自负一代文宗:刘基研究》《汤显祖的岭南行》及《民国衣冠:旧制度与新时尚》《饮食江湖:近代中国的餐馆、城市与文化》等二十余种

另一方面,我未放弃古代文学的研究,继续发力元末明初文学研究,出版了《大儒与半仙:刘伯温新传》等。这些研究与写作,进一步强化我的传统文素养,有助于饮食文化史写作的境界提升。

士志于道,学术其一。无论何时何地,无论过去将来,我将继续以学术为志业,坚持研究与写作,为饮食文化史和明清文学史的研究做出新的贡献。

上书房

〔书径〕

“原始以表末”。黄天骥先生当年带着我们研读元典,殆即此法,最是终身受用。

〔书语〕

频年多病,以致抑郁,阅读、研究和写作成为安身立命的一大根本。

〔近读〕

- (1)《隐士的餐桌:〈山家清供〉里的山野滋味》,林卫辉著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;
- (2)《味染欧罗巴:中国饮食文化在西方》,周鸿承著,中华书局;
- (3)《乐飨太平:太平馆餐厅的流淌岁月》,香港明窗出版社;
- (4)《沉埋的粤菜档案》,徐子君著,香港字字研究所有限公司;
- (5)《食事小集》,卢前著,金小明编,南京开卷书坊。

〔自荐〕



《饮食江湖:近代中国的餐馆、城市与文化》(周松芳著)

本书将民国时期各乡帮菜系走出本土、汇聚都市、最终熔铸为“中餐”这一现代概念的壮阔图景铺展在读者面前。

热议 □吴小攀

为什么副刊大有可为?

此次王蒙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《办气韵生动的副刊》,引起广泛反响,也是媒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种反思、反思。

副刊是报纸的一部分,它所遭遇的困境也是报纸遭遇的困境。15年前,著名报人范长江的儿子范东升教授就曾发出“拯救报纸”的呼吁,有人甚至宣称报纸即将“消亡”。现在看来,都有点言过其实。

报纸存亡的危机感,很大一部分与新媒体的兴起有关系,这在初期可以理解,在不明所以的行外人看来,就更加如“狼来了”一般。但作为行内人,作为媒体的从业者,则需要保持一份必要的冷静。

媒体的新与旧是相对的,广播出现的时候,就有人预言报纸即将被取代,电视出现的时候,报纸又被“消亡”了一回,再后来是互联网的出现。其实,如果说新媒体对旧媒体造成挤压,侵蚀了它的传统势力范围,是可以理解的,但作为不同形态的新媒介,要完全覆盖乃至取代旧媒介,并非易事。正如今天各种媒体仍在各适其适、各美其美一样。

从西方发达国家报业的“他山之石”来看,也是如此。虽然新的媒体生态变动很大,但纸媒依然活着,而且据说还活得不错,这从他们的专卖店里仍有许多报纸售卖也可看出。

在完全市场化、互联网环境下,报纸能存活下来必定有其理由。以《纽约时报》为例,它以付费墙的形式向订阅者收取费用,2012年的纸媒发行和数字端订阅总收入首次超过广告总收入,

打破旧有的报纸依靠广告生存的传统营销模式。它的纸媒周日报发行一般都在六七十万份上下,版面往往达到几十、上百之数,其中就包含许多文学、艺术、体育等副刊版面。

副刊作为报纸的有机组成部分,在中国尤其有优良的传统和重要的意义。中国近代报业的发轫主要源于启蒙救亡,副刊也逐漸从“报尾股”走到了“新一国之民”的位子上。1957年羊城晚报的创办,正是因为要破除当时千报一面的格局,“寓共产主义教育于谈天说地”,后来一纸风行,“花地”“晚会”也成为享誉海内外的著名报纸副刊,国家领导人甚至称赞“《羊城晚报》可以出口”。

毋庸讳言,相当一段时间里,报纸及其副刊都面临读者严重流失的问题,原因主要来自外部,解决的关键却取决于内部——优质内容的提供与传播观念、形式的改进。

当然,这并非一朝一夕之功,改变副刊乃至报纸的既有生态,更是一项长期的综合性系统工程。但不能因此否定其当下的存在价值、努力意义,只要地球上还有人的存在,就必然存在对于信息的需求,各种现代传播媒介就有各自存在的理由。

副刊大有可为。互联网条件下,如何将它办得更加气韵生动,如何让快节奏的现代人爱上副刊,如何让报纸更有影响力、更具生命力,仍有很多工作要做。

“老牛只知夕阳短,不用扬鞭自奋蹄”,从业者既要心怀远方,更要脚踏实地掌舵,重整行装再出发,开拓出报纸副刊的新天地。